

论《呐喊》《彷徨》中的话语与权力

冯凰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1100;

摘要: 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话语既可以为权力所利用, 也可以为权力所生产。权力贯穿于话语之中, 话语表达权力关系, 二者相互融合、密不可分。福柯的微观权力说为我们解读鲁迅小说人物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既然权力无处不在, 那它势必可以通过具体的话语呈现出来, 也可以通过话语得到巩固。在《呐喊》《彷徨》中, 大多数权力关系都是相对稳定的, 但在某些情境下也会发生转换。鲁迅以个体写群体, 以小说中的具体人物象征着现实中的一类人, 那么他们与周边人物的权力关系也就成为了现实的写照。

关键词: 鲁迅; 《呐喊》; 《彷徨》; 话语; 权力

DOI:10.69979/3029-2735.24.10.046

1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观念

按照福柯的界定, 话语是特定社会情境中, 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具体的言语行为, 它不只是涉及内容的符号, 更关联起符号之外的复杂实践活动。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话语既可以为权力所利用, 也可以为权力所生产。权力贯穿于话语之中, 话语表达权力关系, 二者相互融合、密不可分。汪民安在《权力》一文中认为, 福柯的权力不是本质主义概念, 因而无法为之下一个确切定义。他将权力理解为“多重力的关系”, 提出“权力存在于各处, 存在于一切差异性关系中”^[1]。权力以语言的形式, 创造了各种法则, 也操纵着对象, 实现自身的目标。需要注意的是, 福柯的“权力”概念区别于传统的“权力”, 它并非政治威权, 或其他需要反抗的自上而下的压力, 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 渗透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 是多样的、无中心的微观权力。

也就是说, 福柯更为关心的是社会细部的权力运作, 它们往往暗藏在话语中, 为我们所习焉不察。当我们将放大镜对准话语, 便能发现日常生活中大量细微的权力关系, 它们以潜在的、微观的形式存在, 并最终通过话语呈现出来。

本文尝试用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阐释鲁迅《呐喊》《彷徨》中部分经典篇章, 以此揭示人物对话背后潜藏的权力关系, 并联系鲁迅的创作意图进行考察。当然, 我们也可以把作者视作说话人, 把整部小说集视为作家的话语, 当小说正式成为读者的阅读对象, 读者与作者之间就经由文本形成了某种话语实践。这种互动关系很

有意思, 但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 因而把“话语”一词暂且限制在小说角色的具体言语行为上。

2 细微的权力

福柯的微观权力说为我们解读鲁迅小说人物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既然权力无处不在, 那它势必存在于社会各阶层, 左右着人物说话的方式和原因。它可以通过具体的话语呈现出来, 也可以通过话语得到巩固。

《祝福》一文中, 重新回到鲁四老爷家帮工的祥林嫂, 因为寡妇的身份遭到主人嫌弃, 在她照旧想要帮忙摆放祭祀用品时, 四婶慌忙出来制止她, 说: “祥林嫂, 你放着罢! 我来摆。”^[8]四叔对祥林嫂更是反感, 直言祭祀用品不许祥林嫂插手, 否则“不干不净, 祖宗是不吃的”^[8]。这里能很明显看出主仆关系的不对等。首先, 主人可以挑剔仆人, 反过来, 祥林嫂作为仆人, 只能默默接受东家的拒绝。其次, 从鲁四老爷的言论中可以看出, 祭祀用品对经手人还有礼教方面的要求, 像祥林嫂这样嫁了两次的女人是所谓败坏德行的, 自然不能参与祭祀活动。即便她知道自己出于各种原因不能参与祭祀活动, 也无力反抗, 她最大的反抗就是捐门槛以赎清罪孽, 重新获得东家的认可。所以, 不允许祥林嫂放碗摆筷的话语, 不仅体现了主人对仆人的控制权力, 也反映了封建礼法对女性的规训、禁锢乃至毒害。当然, 礼法的制定与实施要靠具体的人, 在文中为首的便是鲁四老爷, 其次是鲁四老爷家的一众人, 最后其他围观祥林嫂悲剧的群众。从礼教规范的角度来看, 祥林嫂毫无疑

问成为了众矢之的，人们嘲笑、消费她悲剧的同时也巩固了封建礼教所带来的规训与惩罚权力。这样一来，祥林嫂之死几乎就成了必然。

权力也可以通过“命名”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狂人日记》中，“我”说出了“吃人”的真相后，大哥冲着门外的一伙人高声说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7]这里大哥的目的很明确，正如“我”在文中所指出的，他是要“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7]。通过“命名”，说话人为他人下了一个定义，建构起了一个形象，为后续一系列行为打好基础，在文中即是指“吃人”一举。疯子的话不可信，所以“我”对真相的揭露也就彻底失效了，所以大哥向众人污蔑“我”是疯子的行为，本质上是在合理化自己的“吃人”行径。包括佃户把大家吃的那个人说成是“恶人”，采取的也是类似手段，因为吃一个好人或许令人难以接受，而吃一个“恶人”，听起来则像为民除害了。而大哥和佃户之所以能够以“命名”的方式合理化自己的罪行，是因为他们处于权力关系的上位。“我”难以反抗大哥，正如狼子村那个被吃的“恶人”反抗不了佃户的意志，所以弱者的反抗几乎是绝望的反抗。

《故乡》中闰土对“我”的称呼由二十多年前的“迅哥儿”变成如今的“老爷”，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幼时的玩伴现在需要讲究客气和规矩，说明在分别的这些年里，闰土早已深深地接受并认可了封建等级观念，他话语中的谦恭，使“我”深刻意识到二人之间可悲的隔膜，这种不平等关系已经无法消除了。

福柯的话语理论十分关心怎么说与为什么这么说的问題，在他那里，话语是有力量的，人们在谈话中建构起对自己以及他人的认识。同样一种意思，换用另一种表达，甚至仅变换一个字词，即可实现完全不同的效果或功能。为了表现咸亨酒店中的众人对孔乙己的嘲讽态度，鲁迅在人物对话上下足了功夫，譬如“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7]看客们言辞中的鄙薄、轻视、嘲笑尽现，而自诩读书人的孔乙己势必不认同他们的看法。他也会反驳，但是与旁人的嘲笑相比，他的争辩声显得弱小而无力。看客们用层出不穷的话语嘲笑孔乙己，通过贬低他人满足自身的低级趣味，孔乙己在咸亨酒店这个场域中几乎沦为所有人的笑柄，是社会身份最尴尬因而最受歧视的一位。他的人格可以被肆意地践

踏，好意可以被无情地打翻，均源于他的弱势地位。

阿Q也常常在权力关系中扮演弱者的角色。他就连什么时候死，如何去死，都是由别人来决定。阿Q临死前，一个长衫人物要他签字画押，他说自己不识字，于是对方表面上退让一步，说：“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7]本质上是在用话语操纵无知的阿Q，使他不明白地走向了死亡。这里的长衫人物可以看成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和阿Q所代表的庸众构成了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不识字的阿Q不仅没有话语权，连知情权也被剥夺了。

阿Q在未庄常常受到周围人的欺侮，然而他又是一个自尊自大的人，有时不免要去羞辱别人来给自己找点痛快。一日他挨了打，迎面走来了小尼姑，他便抽刀向更弱者，将怒气和怨气通通撒在对方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7]小尼姑不予理睬，他继续凑上前去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7]阿Q用言语羞辱了小尼姑，并在此过程中短暂地扮演了一回所谓的强者，因而分外得意。然而强者欺凌弱者的行为永远没有尽头，今日的强者未必永远是强者，弱者之外还有更弱的人，如果将优胜劣汰的观念付诸于实践，就会产生如此人人互相伤害的局面。

《伤逝》作为涓生的手记，是他个人的内心独白，并且在他写下这些文字时，子君已然离开人世，所以读者对子君的认知完全由涓生一个人主导，子君的形象也是通过涓生的话语建构起来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在写手记的一开始，涓生与死去的子君就构成非常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第一，死去之人无法来自我申辩，所以不论涓生所做的陈述是否属实，子君都不能做出回应，只能任凭对方勾勒。第二，《伤逝》通篇采用涓生视角，因而势必以涓生的感受、判断、回忆为主，忽略了子君一方的感受，其中很难说没有虚伪矫饰的成份。

由此可见，话语总是以利于说话者的面貌出现，是权力的工具；话语反映了复杂的权力关系，是权力的结果。《呐喊》《彷徨》中的人物对话，充分展现了强者的麻木冷酷与弱者的绝望可悲，他们均置身纷繁复杂的权力关系中，这种权力关系是由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经济水平等各种原因造成的，鲁迅的关注点则主要集中于人的精神。封建礼教对人精神的摧残，国民的麻木不仁等，无形之中影响了权力的产生，并最终通过话语展现出来。

3 权力的转换

以上例证中的权力关系都是相对稳定的,比如酒客们与孔乙己的关系、涓生和子君的夫妻关系、鲁四老爷与祥林嫂的主仆关系等等,强与弱的对比都很鲜明,且在小说中基本没有产生变化。事实上,在福柯那里,权力是非常灵活的存在,它无时无刻不被生产出来,是流动的、常新的。

《祝福》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祥林嫂向我询问魂灵的有无。我们一般会认为像文中“我”这样的人是启蒙者,而像祥林嫂这样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是被启蒙的一方,所以更为普遍的情形是祥林嫂听不懂“我”的话,而在文中,面对祥林嫂的三句问,“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8],这个时候权力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祥林嫂的问,未必是想使我疑惑、窘迫,她可能只是急于得到一个答案。而这一问,却令我陷入了沉思,仿佛受到了拷问一般,局促而害怕起来。这一对话事实上生成了新的权力关系,“我”作为祥林嫂口中那个识字的出门人,在人生的终极问题面前,也是同样给不出一个确切而肯定的回答的,这就显示出我力量的“小”来。

这其实也是鲁迅在进行自我反思。包括下文中关于“我”的一大段心理描写,正体现了启蒙者的怯懦,面对弱者的提问,“我”在事后却想着如何为自己开脱,倘若“我”的话使对方想不开而走向灭亡,岂不是要担责?于是“我”总结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8]这便是知识者的权力,只要有了“说不清”这三个字,就不必承担什么实际责任了。鲁迅所反思的,首先是启蒙者能力方面的局限性,其次便是道义上的局限性。而所有这些,都是由祥林嫂的问话引起的。

类似的还有《一件小事》里的车夫。车夫主动扶起老太太的义举使“我”非常惭愧,“我”重新审视自己,认识到自身的卑琐。也就是说,车夫无意中拷问了我,这也是一种权力。

《狂人日记》中“我”与大哥之间的对抗,也可视作“我”与封建礼教对抗,结局自然是大哥一方取得胜利,而“我”去到别处做了候补官员。狂人的日记中记

载了“我”试图说服旁人令其不再吃人的经过,态度不可谓不恳切,然而无人在意自己是否吃了人,更谈何改过自新。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听了“我”的话,最后却说:“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7]吃人已经成了寻常事,为众人所接受,却并不能摆在台面上说。当狂人“说”出真相,希望旁人听了能够向善时,殊不知已经触犯了社会的禁忌,而社会自有一套规训的话语,使狂人慢慢服从,慢慢变成社会需要的样子。比如诊脉的何先生会劝狂人不要乱想,二十左右的青年人话语之间为吃人一事打掩护,狂人的言行最终被解读成是患了迫害妄想症等,都可以看出狂人的话语在社会话语面前多么无力,寡不敌众,实力悬殊,他反抗的彻底失败也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鲁迅写狂人是看到了启蒙者的悲哀,写祥林嫂是为农村底层传统妇女立像,写阿Q则是将目光放置在贫农身上,正所谓以个体写群体,小说中的具体人物象征的是现实中的一类人,那么他们与周边人物的权力关系也就成为了现实的写照。

参考文献

- [1] 汪民安:《权力》,《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 [2] 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 [3] 朱崇科:《当知识化为权力——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型”话语》,《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 [4] 苏勇、赖大仁:《〈红楼梦〉中的权力与话语——以贾宝玉和晴雯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 [5] 陈绪石:《知青小说、王小波与福柯——评〈黄金时代〉的新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 [6] 李怡:《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权力化语言》,《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 [7] 鲁迅:《呐喊》,中华书局2013年。
- [8] 鲁迅:《彷徨》,中华书局2013年。

作者简介:冯凰(1999-),女,汉族,浙江丽水人,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